书信中的中国魂

萧海春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写道:“中国读书人很喜欢写信。”并且还敏锐地观察到,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一直把注意力放在书面语言的发展上,而且书面语言的遣词造句都很讲究,与平常的口语差别很大,那些书翰大多用行草书写,逸笔草草,性情流露,字如其人,捧读来函,可令收信人想象着千里之外他们的音容笑貌。一页优美的信札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其书法之精可为书史鉴为经典楷则,如魏晋王右军父子、唐之颜真卿,元之赵孟頫,明之董其昌,皆是尺翰大家。尤其是魏晋时,尺牍非常盛行,有谚语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尺牍虽为小道,“达情愫、通款曲、陈事理、寓箴规,片语修辞,令人解意。”“文虽简,然有裨于实用”,其实唯有尺牍。

王羲之就是尺牍书体的圣手巨擘,如丧乱、奉橘快雪、初月、姨母、十七帖等都是书信体的经典。王氏的行草新体与他书写的内容相契,因为友朋亲族所书的短笺、便条都率性随意,体现着书信体的洒脱之自由,可谓“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也。余观其帖,不时有一种“凭虚构象”的激动。尤其使我心仪的颜真卿,“二祭一稿”之墨翰,每读之使我游弋在一种莫名状的兴奋之中。颜真卿的字,有人说是在狂草中诞生的。他的“忠义堂法帖”中的“送裴将军诗”就是很好的注脚,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狂草杂交的杰作。如果颜鲁公不深谙草书笔法,如何使各种字体统一贯穿在狂草的表现中。苏东坡评颜书曰:“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黄山谷评颜书以为“体制百变,无不可人”。难怪苏、黄二位先生对杨凝式如痴如醉,杨疯子书之神韵皆脱胎于颜鲁公。余学书,初为题画用,故择书从画之意趣来选择书家书,见鲁公争座位帖便如遇奇古之人,倾慕不已。苏东坡评:“此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手自书,动有姿态。”“三稿”都是草稿,行押简札在力度强弱和速度疾缓上气质非凡。临书如与祭姪帖互为参合,会得益匪浅的。历代画家皆是书家,米芾和东坡皆精于画;元之赵孟頫、倪云林、梅花道人;明之青藤、白阳、董思翁皆为一代大家;近代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都是诗、书、画、印巨擘。书画同体,同一血脉,书为心画。余与书互为切磋,已一发不可收拾。建立在抽象文字符号基础上的书法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混沌朦胧的意象冲动,其境则如“情多佛郁”或“意涉瑰奇”,也或“怡懌虚无”又“纵横挣折”,临池学书之中获益颇多。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时还观察到书法这种艺术,在中国比欧洲更受人重视,讲求书法是中国信札文化的又一大特色,中国最早的书信书法收藏便是从尺牍开始。汉代有位书家由于书法太漂亮了,皇帝是他的铁粉,尤嗜好其尺牍书法,居然专门派人请他在病榻上写几通草书尺牍以便收藏。在魏晋士大夫之间,书法竞技也是以互通书信的方式进行的。南朝的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鲈鱼,遂命驾而归,“莼鲈之思”此札已成名翰。唐宋以后。刻帖成为保存和传播古代书法的重要手段,而尺牍也成为刻帖类的大宗。明清翰帖已洋洋洒洒蔚为大观。

2019《五姐妹》

叶辛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刚刚过去,我们又站在了新年的门槛上。新年,意味着破旧纳新;新年,也意味着蓬勃的开端和希望。本组十日谈,邀请上海文化艺术界人士同我们一起展望崭新的文化的春天。　——编者

一切从1978年出发。

那一年,我虽然仍然是一个挣工分的知青,但是出版社已经出了我最早的三本小说《高高的苗岭》《深夜马蹄声》和《岩鹰》,于我更重要的是,我在偏远的乡间完成了心中最想写的知青命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而透过贵州层峦叠嶂的山山岭岭,我分明感觉到这个世界要有变化了,我的命运要有变化了。这是很怪也是很奇妙的感觉。

40年以后的2018年,两家出版社重版了我的16本长篇小说,其中包括了1978年的《高高的苗岭》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虽然在2018年,另外两家出版社也出版了我的2本新作《上海传》和《上海·恋》,但对我来说,两套8卷本的长篇小说重版,似乎更加意味深长一些,尤其包括了初涉文坛时的两本书。

现在,进入2019年了,在前几天上海图书馆的一场文学演讲结束之后,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老知青读者问我,在新的一年里,你又在写什么?没有等我回答,就围上来三四个人,他们显然也想了解。我告诉他们,我要写下的一本新书叫《五姐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大、老二到五妹的五个姐妹,而是五个50岁女人的命运。一个读者要求我透露一下可以讲的内容,我说想写这么一本书已经30多年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听说四川会理六姐妹、贵州黔南四姐妹的生活原型时,我就想写一写共同出生于1953年的五个姐妹的人生和命运了。

想想吧,从情窦初开的17岁,五姐妹要经历一生中所有的故事,五个姐妹要同五个男子恋爱,五个姐妹要嫁给她们心仪的丈夫,她们要组成家庭,要经历感情的波澜和背叛,她们会养育子女和处理第二代的关系,她们的命运不一样,性格有差别,各自走过的人生也不一样。

其实她们的人生,岂止是五个50岁女子的人生,她们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20世纪下半叶的50年,她们人生故事的后景,正是中国和世界动天撼地剧烈变化的50年。哦,想一想五姐妹,也会是一件激动的事情。读者笑着说他们期待这本新的小说,我说我也期待着。我恨不得现在就坐到桌子边去写,不过天气太冷了,就如同太热了一样,太冷和太热都不适宜写作,还是等春暖花开时节。

2019年的春天很快就要来了,我和读者朋友们一起期待着。

十日谈
新年新愿
责编:殷健灵

明日请看曹可凡谈《大美诗书画》。

寒山寺的钟声

梁永安

到苏州,送别公历年的最后一天,寒山寺的钟声,一年又一年。

出了高铁苏州站,先乘地铁到木渎,这颇有名气的古镇,还没来过。天色有些阴,人气倒不减,熙熙攘攘色调鲜艳。江南老镇,都是水网中的聚落,河道、石桥、木船,切分又连接着粉墙黛瓦,承载着百姓有苦有乐的生活。

河岸有一家“初见书店”,店名让人一叹,让人想到假借仓央嘉措的伤情诗,“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拐个弯,发现书店的后墙上还画了一只大龙猫,这书店的治愈风,原来藏在后面。

木渎的特产是枣泥麻饼,芝麻很香,枣泥很细,初吃觉得过甜,每年都吃一点儿,却也渐渐习惯,就像和一个人处久了,不适应的地方反而改变了彼此,变成相依的必须。心里暖暖地买了两盒,带回上海延续心意。

很快去寒山寺,寺里有寒山和拾得。这两位佛界的罗汉,化为人间的苦行僧,经历了种种甘苦,于是有一番深切的对谈:

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

拾得曰:“只要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这对话被书写在东山紫金庵的显赫处,也于去年登山看到,豁然一亮,又低头品味儿,感觉有些怆然。人世有明有暗,犹如月有阴晴圆缺。黑暗“不要理他”,光明仍需珍惜。于是心里默默加了一段:

拾得问寒山:“世间有人暖我、助我、誉我、励我、厚我、护我、爱我、怡我,如何回报乎?”

寒山曰:“只要谢他、育他、许他、顾他、忆他、知他、伴他、惜他,一生一世你不负他。”

这就是年年到寒山寺听钟的心情啊,108声长鸣,飘荡在冬夜的天空与大地。它不是消散的烦恼,而是久远的感恩。感恩一切善良的人们,感恩天造地设的相遇,感恩繁星下温馨的想念……

柯灵故居(油画)　罗陵君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那些电话、电报、传真,将被“伊妹儿”和视频所取代。游子向父母报平安,离别的情侣互诉衷肠,友朋间的互送问候,也已经不用写信致意了,似乎一切都可以网络化。其实不然,人们被琐碎生活所困扰的同时,现代简洁便利的“工具时代”相反把人从繁琐的细节中解脱出来。人是有精神的,传统文化就像我们流动的血脉,那些曾被尺翰激动过的人们,都会洒脱悠闲地游走于博物馆和闲适的书房里雅鉴古今,游弋于书法的天地里,寻找那些令人扼腕的叹息故事和笔走龙蛇的书意热情所赋予的那种体温。今天,我们在闲暇的空间之余,拿起毛笔,砚墨理纸,以尺牍的形式来书写那份曾被经典感动过的热情,“感而遇之,会心不远,必有妙绪,发为雅言,以抒其蕴蓄”“然景有流变,情无古今”,不以其杼由乎尺素,抑扬乎寸心。

八仙桥忆旧

施之昊

我不清楚八仙桥名字的由来,它所在的范围约莫是东西从云南中路到黄陂南路段,南北从金陵中路到延安中路附近。一条延安东路高架如同插入八仙桥心脏的利剑,之后上海音乐厅的平移工程与延中绿地的建设,如同把这件利剑拔出。这样八仙桥就彻底被摧毁,消失在今天的上海市地图上。

我幼时几乎每周末都要去那里,因为我舅公的丈人(我叫太公)就在宁海西路上住,他们每周都要在那里打牌,我便一同前往。在太公家吃个午饭,之后大人们打牌,我就和阿姨们一起在八仙桥玩一下午。去的最多的是沪光电影院。我已经忘记沪光电影院的模样,只记得当时看电影大光明票价最贵,之后便是和平电影院(今和平影都)与它了。并且在老一辈嘴里听说那里应该是在市政建设中被保留下来的优秀建筑。他们说的同样应该被保留下来的还有在那里的吴湖帆故居。海上画派“三吴一冯”(吴湖帆、吴待秋、吴子深、冯超然)齐名,这四位大家均在今嵩山路附近,也属八仙桥“板块”。

同在嵩山路的还有“大众剧场”,原来是黄金荣的“黄金大戏院”。我在那里看过电影,彼时给人的感觉已经很陈旧了,那里台前幕后的故事在民国作家的掌故里或能找到。宁海西路原来是一条马路菜场,彼时上海菜场多在马路上。那条路上我记忆最深的美味就是“唐记鱼圆”。我看到他们用整条海鳗制作鱼酱,每到春节总要排队购买。

八仙桥青年会至今还在,掌故家高伯雨记载他一九三二年抵沪,就是住在“新落成”的基督教青年会中。“这时候我住法租界八仙桥新落成两个月的基督教青年会宿舍。”是年高氏二十七岁。

美味往往能够留住人的记忆,八仙桥也不例外。龙门路武胜路一带有一家做黄桥烧饼的店,这种江南美味今天至少在上海再也没有吃到过。后来得知黄桥烧饼竟然与爱国主义扯上关系,据说是因为黄桥是新四军当年重要的“根据地”。还有的美味就是在近今宁海路金陵东路附近的“新城隍庙”。上海豫园有一个老城隍庙,闻名遐迩。这个新城隍庙是“假古董”,有几个飞檐翘角的建筑,因而得名。在那里有洪长兴与小金陵两家美味。洪长兴涮羊肉店,据说老板尝为马长兴(京剧大师马连良伯父),马氏为回族,凡到上海演戏,总是光顾这家清真馆子。我还记得当时的洪长兴还有一个洋葱头建筑,类似于莫斯科红场那样。

那里还有一家好吃的地方就是“童涵春堂”。我少时染病,一直吃这家中药店的金银花露,别人都觉得是药,我却觉得很好喝。这家店原来就在音乐厅边,店招是清朝第一百零一名状元陆润庠手迹,陆氏与我同乡,今日所见他的招牌不多了,但是晚清民国年间他可题了不少店招。

上海音乐厅原本叫南京大剧院,当时民国政府首都在南京,可见其地位,据说宋美龄热爱音乐,故而得名。原来其周围都是民居里弄,只有延安路一面有门,之后造了高架、绿地,再将其平移,背面里弄也拆迁完成。音乐厅就“一丝不挂”地曝露街头。今天看起来也就沧海桑田了。

我读初中的时候还在上个世纪,记得从公交车518路终点宁海西路站坐到闸北延长路上课,那时八仙桥还在。

雨中有风景

富晓春

每次陪父亲上医院,即便是晴天,我都随身捎上那把手柄长长的浅蓝色天堂伞。父亲拄着拐杖,我扛着伞,或一左一右,或一前一后,招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出门扛伞,我不是想在下雨时有备无患,而是期待碰上伞的主人。

大约一个月前,我携父亲从医院出来,遇上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当时正值出租车交接班,医院门口打不到车。灰蒙蒙的雨水横扫过来,街上的行人纷纷四处逃窜。我与父亲缩着颈脖,躲进公交站台的人堆里。狭窄如一叶扁舟的公交亭,根本不能遮风挡雨,豆大的雨粒稀稀拉拉地敲打在父亲光溜溜的脑袋上,顺着脸颊的沟壑往下滴……

父亲教师出身,早年下放做过木工,干过粗重的农活,日晒雨淋为家常便饭。可现今不行,毕竟已耄耋之年,还患上恶疾,身体极度虚弱。每次上医院,总是步伐沉重,靠着我连推带拽。我成了他的拐杖兼助动车。

当我脱下外套要给父亲披上,却意外地发现父亲正举着一把浅蓝色的天堂伞,伞下绽开的是一张满是笑意的老小孩顽皮的脸。我问伞从何而来?父亲说是刚才有个女孩随手递给他的。我像教训小孩一样责怪他:“你怎么可以乱拿人家东西呢?”他说:“人家递过来,我就拿了,我还以为碰到熟人了呢。”

我循着父亲手指的方向,从眼前晃动的人群中隐约看到了一个陌生女孩匆忙的背影。只见她扎着马尾辫,挎着一只奶白色的帆布双肩包,正急匆匆离开站台。当我拽着父亲拨开人群追上前时,她已经钻进一辆正在启动的公交车走了。

我与父亲举着这把伞,默默地伫立在站台上,目送着公交车渐行渐远;透过飘洒着雨水的车窗,远远地隐约看到一位面带笑容的年轻女孩紧贴着车窗正向我们挥手示意……

年轻女孩雨中友善的微笑和贴着车窗挥手的情景,就像冬日和煦的阳光温暖着我。我想,她应该是这个公交站的常客吧,或许还在附近某个单位或公司上班?在之后陪父亲看病的日子里,我无数次带上这把伞,拽着年迈的父亲无数次来到这里挤公交,我思忖着或许能再碰上她。

遗憾的是,我最终没能等到伞的主人出现。我终于明白,烟雨红尘,茫茫人海,我是不可能将伞还给人家了。也许,她只不过是匆匆路过的一位过客,只是她的微笑给这个寒冷的初冬带来了一丝暖意,像天使一般留在了我的心里。

在同样一个下雨的日子,我将这把浅蓝色的天堂伞随手递给了同样在雨中等车——一位比我父亲年纪还要大佝偻龙钟的老太太。她疑惑地看着我,有点惊慌失措,欲言又止,几次想将递到手心的伞推开。当老人恍然明白过来,便竭力向上踮起脚尖,挺直躯干,高高地举起撑开的那把好大好大的天堂伞,笑脸犹如深秋之菊……

我远远地驻立着,观望着,举起手臂向老人不停地挥手,微笑着向后退去,缓缓走出她的视线。雨中的天堂伞。伞下微笑的老人。挥手致意的我。街上像潮水般流淌的车流、人流。各种轮胎与各式各样的鞋夹杂着雨水发出的“嗞嗞”声,还有不知从哪间门店抛出的几声撕破嗓门的尖厉叫卖声……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独特的城市风景。好美!

夜光杯